

博士生延期毕业原因何在

■本报记者 韩天琪



闵庆文



雷红星

又到一年毕业季。按照一般博士生学制的规定,秋季入学满三年的博士生们此时正忙着最后的答辩,顺利的话不久就可以拿到学位毕业了。不过近几年来,虽然博士生招生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毕业博士生人数却逐渐趋于稳定。科学网博主于淼在《二十年博士延期之怪现状》的博文中进行了一系列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目前博士生延期毕业概率超过了50%。

为什么会出现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现象?这对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哪些要求?《中国科学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相关科研人员。

博士生延期毕业挺无奈

北京某高校软件专业在读博士生张克(化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是其攻

读博士学位的第6年,2011年入学的他本以为在2014年会顺利毕业,不过因为毕业论文及发表文章都不太顺利而延期至今,并且尚未有清晰的毕业时间。

张克坦言,博士阶段的学习与硕士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为了训练他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导师以一个“准科研人员”的标准和要求培养他。“说实话压力挺大的,一直拖着不能毕业,学业压力大

不说,就业也受影响。”张克说。针对这种现象,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雷红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每个培养单位都有自己的博士生培养要求,比如说像中科院的很多研究所就要求博士生在毕业时发表SCI文章。“很多科研工作探索性的,不一定能按照毕业时间发表,而且文章的审稿也需要周期。”雷红星说。

张克正是由于发表论文受阻影响了毕业计划,而且据张克介绍,在他身边与他情况相似的同学不在少数。

多方原因造成

“我们必须客观评价目前教育改革之后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和毕业的现实情况。”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是按照精英和研究型人才来培养的。但近些年,特别是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后,研究生培养模式与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后绝大多数是去科研单位,但现在有相当比例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毕业后不进入科研单位进行科研工作。全社会、培养单位和硕士生、博士生本人的要求都发生了改变。”在闵庆文看来,这三方目标的变化是造成博士生延期毕业状况普遍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也让老师们无法顾及到所有学生的培养。“中科院的老师普遍带学生比较少,很多一届只带一个学生。但很多高校老师和博士生的比例是失调的,这对博士生的培养有所影响。”雷红星说。

同时,入学博士生的生源质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博士生有很多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接受了较好的学术训练。“也就是说,在出口时按照精英类的标准要求,但入口时的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其中老师和学生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是有区别的”。以闵庆文的切身体会,博士生生源质量的参差不齐造成了所需付出努力和时间的差异,也对毕业年限有所影响。“在博士生培养阶段,这种人口和出口的落差,的确导致了博士生培养工作的现实处境。如果说按照精英类和研究类来培养的话,这个学生所付出的代价和时间相比以前就要大得多。”闵庆文说。

还有就是就业因素,一个国内一流高校的本科生毕业后的出路无非以下几条:在本校读研或直博,到别的培养单位读研或读博,出国读研或者读博,还有就是就业。

“由于一流高校学生的素质普遍相对较高,

所以在社会的就业机会比较多,好有人在毕业后直接选择了就业。学生的选择在其中就分流了。如果一流高校的本科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的目标就是做学术研究,他(她)在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往往全力以赴,很少出现延期。反而是科研目标不太坚定、随波逐流的博士生群体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科研目标不坚定,可能就没有打下很扎实的学术基础,面对高标准的博士培养要求时就要比其他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闵庆文补充道。

培养机制有待完善

闵庆文强调,我们必须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合理的定位,首先要明确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其次,现在很多高校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进行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分类。对此闵庆文认为要做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分类。“国外有很多高校可能不培养硕士、博士,但会培养社会中需要的人。整个博士生培养制度的改革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医科大学的医生,但护士很少?我们有一大批人读硕士和博士,想进入高校工作,但我们缺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弄清楚社会的需求,而一味地抬高学历。”

闵庆文认为,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类的基础上应该对人才进行分类,不能简单用学历来衡量人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医生,既有做理论研究的医生,也有临床的医生,法律专业的学生将来既有做律师也有做法学研究的。“我们在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中应当有所区别。科学研究特别是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必须有敬业的精神,而不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和就业压力选择继续深造。这就需要改变社会观念并建立引导机制。”闵庆文说。

智库

建立跨区域扶贫开发一体化体制

■赵作权 赵璐 陈芳

我国集中连片分布的贫困地区,几乎占据国土面积的一半江山,是实现全面脱贫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建立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层层推进,纵向布局不断深入,但横向布局相对薄弱,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东西协作机制已难以满足我国区域性整体脱贫的重大战略需求。为此,建议以区域扶贫委员会为主,扶贫开发合作区与扶贫专区为副,建立新的横向扶贫开发为特征的跨区域扶贫开发一体化体制,通过资源整合、部门协同和法律保障,探索我国加快脱贫进程的多层次、多部门协同扶贫新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一、当前扶贫开发面临跨区域协调和资源整合难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国精准扶贫战略正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扶贫开发工作层层推进,已经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和东西协作机制,体现了以纵向协调为主、横向协调为辅的多层次、多部门协同扶贫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我国扶贫开发横向布局相对薄弱,片区内部及相邻片区之间缺乏联系协调机制,相邻地区特别是跨省区的扶贫开发合作风气尚未形成,跨区域扶贫开发力度不够,已不能有效应对我国区域性整体脱贫的重大需求,不利于连片特困地区加快融入国家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步伐。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扶贫开发表现出高度碎片化特征,贫困地区各自为战,竞争激烈,资源整合十分艰难,共性突出问题无法解决,扶贫政策协同力度在县域层面非常有限,

严重阻碍我国扶贫开发整体效率的提升。一方面,片区联系仅提供信息共享,而资源力量相对分散,沟通协调困难。跨行政区划由政府协同扶贫还停留在中央行政推动下,采取地方政府集体磋商的形式很少,主要是各自安排和推动扶贫工作,扶贫开发资源一体化遥遥无期,不利于集中解决贫困地区脱贫、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这些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扶贫资金和项目分散,“碎片化”问题突出,片区内部资源难以整合,导致资金使用效率太低。如贵州省丹寨县2014年收到专项转移支付资金5亿多元,涉及260多个专项,由40多个部门管理。但一旦地方整合这些资金,又与专款专用的有关规定不符。

二、跨区域扶贫开发困难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扶贫开发中一直强调要资源整合和部门协同。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要求统筹集中使用资源,创新扶贫开发资金使用方式;推进扶贫开发法治建设,完善扶贫开发法律法规,抓紧制定扶贫开发条例。发改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发挥交通扶贫脱贫攻坚基础支撑作用的实施意见》(发改基础[2016]926号)倡导建立健全脱贫攻坚多规划衔接、多部门协调长效机制。尽管各相关部门和地区在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有效机制与路径问题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东西协作和片区联系的区域合作扶贫模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停留在中央战略政策指导规划层面,在推进区域合作扶贫工作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跨区域扶贫开发一体化的统筹运行体制机制。

我们分析认为,要切实把握推进区域合作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关键是需要规范制度和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在跨片区、跨省区层面设置有效的组织协调体系载体,在跨县域层面建立有力的组织实施体制,并设立统筹资金支持跨区域扶贫开发。这样才能切实地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围绕跨区域贫困地区的共性紧迫性问题,充分调动地方在脱贫工作组织协调的主动性,实施执行规划设计,统一集中配置资源,大规模持续有效地开展区域脱贫合作扶贫工作,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一体化和减少制度运行成本,有效地解决跨区域扶贫开发系列突出问题。

三、促进跨区域扶贫开发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为加大扶贫开发一体化战略顶层设计,进一步解决跨区域扶贫开发的部门协同、资源整合不畅问题,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加快贫困地区融入国家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步伐,建议抓紧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完善我国跨区域扶贫开发一体化体制。

第一,设立区域扶贫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加强跨区域连片特困区扶贫合作统筹协调。委员会负责扶贫合作战略规划、扶贫研究和宣传;扶贫合作项目的批准、执行和监督;跨片区扶贫合作工作。委员会设立主任、共同主任,主任由国务院直接派遣,共同主任由相关省省长(区主任)轮流担任,委员由相关省省长(区主任)兼任。委员会实行主任同意下的简单多数决策制度。委员会工作计划、战略规划等需上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

第二,建立两层次的扶贫合作组织管理体系,提高跨区域扶贫开发整体效率。设立一体化扶贫合作区,负责与区域扶贫委员会联系,落实执行区域扶贫委员会在本省区部署项目。整合现有14个连片特困区,分别设立中部—东北一体化扶贫合作区(包括5个连片特困区,涉及10个省区724个县)、西部—西南一体化扶贫合作区(包括9个连片特困区,涉及12个省区152个县)。在一体化扶贫合作区下设立扶贫专区,负责围绕相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突出扶贫优先支持重要方向和重点领域,设计扶贫合作项目,并向区域扶贫委员会提出项目申报。专区由若干个县构成,专区设立理事局,由相关县县长担任理事。

第三,设立区域合作扶贫专项资金,加大资源统筹配置使用力度。单独设立区域合作扶贫专项资金,通过提取中央和地方(相关省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20%-30%以及教育、民政、医疗、社保、救助和社区发展等民生保障部门财政资金10%-20%组成,并吸纳部分社会资金参与。专项资金可单独下设基础设施发展基金,用于跨连片特困区的铁路、高速公路、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以及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

第四,制定发布区域合作扶贫法案。研究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区域合作扶贫法案,明确区域扶贫委员会的权力、职责、组成和运行机制;确定区域扶贫委员会与中央政府部门的协同机制;明确对所属连片特困地区没有行政管理权,只有项目管理权,与现行的基于党政领导的扶贫开发组织模式实现互补共生关系。(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三思堂

栏目主持:韩天琪 邮箱:tqhan@stimes.cn

共享充电宝应防范安全风险

■沙森

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之后,共享充电宝正在进入人们的生活,为共享经济再添新成员。

所谓共享充电宝,就是一种充电租赁设备。用户在屏幕上扫描二维码,凭借着芝麻信用分600分以上就可以不用押金,一小时免费使用充电宝,超过1小时后是1元/小时,当天10元封顶,如果没有600的信用分,那也只需要交100元押金。只需要扫码—注册—付款—借出这几个步骤就能很快完成租借。归还的方式和单车比较接近,用户可以在公众平台上根据充电宝的GPS定位就近归还。

据公开数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包括小电、

街电在内的所有共享充电宝所获得融资金额已经近3亿元,超过20家机构进入共享充电宝领域。

目前全国很多商场、餐饮场所、火车站、超市、医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都放置了这样的设备,多个商场、火车站等网点都可以租还充电宝,全国网点可以通过借还。

不过,共享充电宝在给市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与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不同的是,由于共享充电宝需要与手机直接连接,一旦市民遇到被改装过的充电宝,使用USB接口进行充电时,手机里的

个人账户以及支付密码等信息有可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中指出,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0亿元。分享经济领域参与提供服务者约5000万人左右,约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未来十年中国分享经济领域有望出现5~10家巨无霸平台型企业。

对于共享经济平台企业来说,避免恶性竞争,制定行业规则是当务之急。共享经济发展迅速,相关法律法规正在完善当中,行业自律在此

时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尽快组织力量针对共享经济形成的市场环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共享经济各平台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发展。

市民在享受共享经济带来便利的同时一定要树立安全意识,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以免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损害。

面对互联网模式下的新经济形态,市场、监管部门、法律法规和市民每个人都应当为完善新机制、建立新规则做出努力,为共享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党群

分院作为中科院机关的派出机构,在党建工作中,分院分党组既按照地方党委的部署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又结合中科院实际情况做好系统各单位的党建工作,在服务各单位创新创业和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今年中科院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白春礼院长提出,“各分院要推动和促进本地区、本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要用科技创新工作的成绩来检验。”回顾成都分院党建和创新的工作的情况,我体会是主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坚持抓实中心组学习研讨。坚持分党组季度中心组学习、直属单位党委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两个“准则”和两个“条例”。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通过理论学习,确定了分院为研究所和科技服务人员服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抓手,加强机关自身建设的“两服务一加强”工作理念。在2016年第一季度中心组学习,我作了题为《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两个服务”创新工作》中心发言,坚持问题导向,从分院年度考核、民主生活会征求到的意见着手,重点在“一做”中提出改进措施,将“两学一做”与“两个服务”紧密结合。在2017年的第一季度中心组学习,我作了题为《深入学习找对标,明确责任抓落实》中心发言,从其他11个分院的年终总结中找亮点、树标杆,提出机关各处室的目标责任,通过讨论形成年度的目标考核责任制,在“一加强上”下工夫。由于分院分党组中心组学习会抓得实、成效显,已连续两年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中心组学习先进单位。

一年来,成都分院积极协调推进了中科院与川、渝、藏三省市区签订了新一轮的全面科技合作协议,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生态农业等方面一批重大项目转化实施。据统计,为川渝藏企业新增销售收入约210亿元,直接为中科院系统各单位争取各类经费超过亿元大关,开启“十三五”科技合作新局面。

坚持抓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充分发挥分党组和直属单位党委的作用,根据不同阶段研究制定方案,抓好各项工作。一是在院党组视频会议后,及时召开分院直属单位委员会和党办主任会再次周密部署、制定下发实施方案,强化各级党组织的责任,以高标准推进学习教育。二是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做好“三个坚持”,即坚持分党组成员带头讲党课,坚持分党组成员旁听院属各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完善分党组成员联系院属单位制度。三是扎实有序、协调推进,结合中科院的特色,开展系统性学习教育。邀请李志刚组长作《以党风廉政建设实际成效为“率先行动”计划保驾护航》的报告,何副秘书长作《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扎实推进“两学一做”》的报告,王庭大原组长作《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报告。成立讲师团送学到所,邀请院内有经验的党委书记苗建明、彭玉水、陈胜利等分三个专题作了18场辅导报告,听众达3300多人次。四是举办分院党务骨干培训班,召开系统党办主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培训会和党支部工作交流峰会,围绕中心服务创新,将“两学一做”落到实处。2016年,光电所“超构表面电磁功能器件原理、方法及应用”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并在神州十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方面出色完成国家任务。

坚持抓常抓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关键环节,分院分党组和各单位党委发挥着抓常作用,形成以上带下、上下联动,层层更进局面。一是落实好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开展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自查、党费收缴情况自查补缴等工作。二是创新方式开展党建工作,举行庆祝建党95周年“重温入党誓词、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命名分院机关“共产党员示范岗”;推进分院系统党建述职考评;联合北京分院举办非党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研讨班;分院统战工作在四川省统战部部长工作会议上做大会交流。2016年,罗晓梅等12人分别获得院省优秀共产党员或党务工作者称号;成都信息公司办公自动化事业部被四川省总工会授予省级工人先锋号,方敬忠、唐章洪2人当选省部级劳模;成都生物所若尔盖高寒湿地生态研究站被团省委评为“四川省青年文明号”。

坚持抓长党风廉政建设。分院分党组与各研究所和机关各处室负责人签订了个性化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落实“两个责任”,加强反腐倡廉工作。认真部署、督促分院各单位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院党组“12项要求”“回头看”进行自查。定期和不定期地深入研究所开展科研项目经费财务收支审计,分院公司内审、研究所领导经济责任审计,选派纪检干部参加院巡视工作和重大项目试点审计等。坚持用好“四种形态”约谈函询,坚持廉政谈话制度,坚持党政负责人和纪检组长讲廉政党课;组织观看《欲望打开堕落之门》等警示教育片,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的成效。

以学促做推进精准扶贫。认真落实四川省委十届七次全委会议精神和院党组的部署,在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8个定点扶贫村,分院分党组高度重视,进行顶层设计,依托成都生物所、植物所等单位的技术,选派驻村干部和科技专家团等方式,深入村户开展定点技术扶贫。重点实施石斛、构树、食用菌、水稻等产业示范项目,带动274个贫困户共1025人,增收1520元/人·年。在2017年四川省人大《扶贫条例》执法检查中获得好评,并获四川省脱贫攻坚“五个一”帮扶先进集体。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

『两学一做』促进『两个服务』

■王学定